

# 阿契贝与小民族语言的解域实践<sup>\*</sup>

姚 峰

**内容提要** 本文聚焦德勒兹文学思想的本源性概念——“小民族语言”，试图考证和厘清犹太作家弗兰兹·卡夫卡的小民族语言思想，而德勒兹正是基于卡夫卡的观点对小民族语言进行了哲学层面的抽象与升华。小民族语言思想为我们从事后殖民文学研究无疑提供了理论利器。尼日利亚后殖民作家奇诺瓦·阿契贝也是运用小民族语言写作的大师。对于在非洲文学界饱受争议的语言问题，阿契贝认为非洲英语对于非洲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具有独特作用和价值。这一观点与卡夫卡的文学语言观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最后，作者指出小民族语言思想对于文学理论和实践的重要价值在于其“解域”性，即打破理论和实践的固有“辖域”，使文学研究和创作处于永不休止的“生成”和“逃逸”过程中。

**关键词** 阿契贝 小民族语言 解域 卡夫卡 德勒兹

DOI:10.16345/j.cnki.cn11-1562/i.2015.02.017

芝加哥大学教授、《批评探索》主编 W. J. T. 米切尔坦陈，尽管最具挑战性的文学批评出自帝国中心，但最重要的新文学却正涌现自殖民地，即过去曾在经济和军事上遭到压制的地区和民族。诺贝尔文学奖、布克奖等最重要的国际文学奖项频频被英美地区外的作家获得，米切尔因此断言“人们所熟悉的文化地图正被重新绘制。”<sup>①</sup>换言之，文学生产的天平正从第一世界倒向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那么，被米切尔称为“后帝国批评”的后殖民理论，由于建构于欧美经典文学，而非米切尔所谓的“后殖民文化”，因而未必受到第三世界作家和知识分子的认同，反而遭到质疑和抵制。然而，第三世界后殖民文学写作的异军突

起未能动摇西方后殖民理论的中心位置和话语霸权。对此，赵毅衡在《新文学史》撰文指出“后殖民主义并非纯粹的理论构想：而试图对非西方国家施加影响……他们并不关心这种文化对于非西方世界的人民是否有益。”<sup>②</sup>赵认为，后殖民理论家在西方学术机构声名鹊起，这往往迫使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按照西方理论家的理论路径和分析话语“言说”。因此，后殖民理论家的学说与“西方的权力”紧密相连，属于西方，而非第三世界本土。

笔者认为，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有关小民族文学的论述有助于解域经典后殖民理论对于第三世界后殖民文

<sup>\*</sup>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阿契贝与非洲后殖民小说”（项目编号：11YJC752034）的阶段性成果。

学的辖域。对于使用前宗主国语言写作的后殖民作家而言,经典后殖民理论难以帮助其摆脱对于帝国中心文学的依附关系,难以从理论上充分论述后殖民文学的独特价值,而这恰恰是小民族文学理论大有可为、施展拳脚之所在。本文结合阿契贝的小说文本,试图梳理和分析小民族文学的核心概念——“小民族语言”(minor language)。何谓小民族语言?德勒兹提醒读者,小民族文学并非来自少数族裔语言的文学,而是“少数族裔在大民族语言内部建构的文学”。<sup>③</sup>因此,“少数族裔”和“大民族语言”是界定小民族文学或小民族语言的两个关键词。第二个问题:小民族文学概念或思想滥觞于何处?研究者往往认为素有哲学概念创造大师美誉的德勒兹是“小民族文学”的最早提出者,而卡夫卡只是运用小民族语言写作的文学巨匠,对小民族文学或语言的概念并无自觉的意识和思考。<sup>④</sup>然而,卡夫卡身后传世的日记为研究者考证其小民族语言和文学思想提供了诸多线索或“踪迹”。

## 一、卡夫卡有关意第绪语的演说与小民族语言思想之滥觞

诚然,卡夫卡并非哲学家,从未建构完整严密的哲学思想体系,然而很多哲学家的理论往往来自作家看似零散断裂的只言片语或随性感悟之中。后殖民理论大师赛义德就曾从本文的研究对象之一——阿契贝的评论杂文中汲取了思想养料;何况,卡夫卡拥有博士学位,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自然是一位更具反思或批判意识的学者型作家。毫无疑问,德勒兹不仅从卡夫卡的文学作品中取得了素材,更直接拼装和重组了散见于卡夫卡的日记和演讲中有关小民族文学的思想碎片。因此,我们首先需要梳理卡夫卡关于小民族语言的论述,如此有助于厘清德勒兹如何继承和发展了卡夫卡的思想,以及存在的问题和疏漏。在 1911 年年底的一则日记中,卡夫卡详细阐述了小民族文学

区别于大民族文学的特征,并试图为小民族文学作“速写”式的概括。尤为重要的是,卡夫卡在日记中首次提出了“小民族文学”(literature of small peoples)这个概念。仔细比照,德勒兹有关小民族文学的论述多少能够在这篇日记中找到蛛丝马迹。但颇为吊诡的是,同篇日记中难觅卡夫卡有关“小民族语言”的文字记述。

然而,卡夫卡于 1912 年在布拉格犹太市政厅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之前的演讲稿为考证其小民族语言思想提供了绝佳的文本。当时,卡夫卡为了帮助在场的听众理解即将开场的朗诵中使用的所谓“俚语”,登台发表了有关意第绪语(Yiddish)的演讲。这段在大多数研究者眼中似乎平淡无奇、缺乏深意的讲话俨然是有关小民族语言的长篇大论,可谓字字珠玑。毫不夸张地说,这篇讲话不啻为小民族语言思想的开山之作。虽然德勒兹在著述中对此只字未提,但研究者依然能够推断德勒兹极有可能阅读过这篇讲话稿,并从中获得灵感和启发。何谓意第绪语?根据《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的词条注释,意第绪语是一门欧洲和美洲的犹太人使用的语言,主要含有德文,并夹杂斯拉夫语和希伯来语,由希伯来语字母印刷。卡夫卡提到的意第绪语是由德语、希伯来语、法语、英语、南斯拉夫语、荷兰语、罗马尼亚语,甚至拉丁语等诸多语言元素捏合而成,历史上曾为德系犹太人广泛使用,后日渐衰微。卡夫卡特地说明了意第绪语的发展源流,这对于我们合乎逻辑地将其定位于小民族语言至关重要。从语言谱系角度,意第绪语与现代德语二者均从中古德语发展而来。在向新高地德语转化过程中,现代德语形成了一种形式,而意第绪语发展成为另一种形式。因此,两种语言实际上存在根深蒂固的同源关系,如果我们视现代德语为大民族语言,那么意第绪语则为少数族裔使用,并在其演化过程中杂糅了大量外来语言元素,因而成

为对大民族语言的小民族应用，是一种小民族语言。虽然卡夫卡的作品都用另一种小民族语言——布拉格德语——写就，而非意第绪语，但所谓的布拉格德语与意第绪语均具有小民族语言的特征，因此研究者完全可以通过对卡夫卡有关意第绪语的论述考证其小民族语言思想。卡夫卡成长于复杂的语言环境中，幼年从捷克保姆口中学会了捷克语，而他接受的是德语教育，正式场合都说德语，同时还或多或少地学习过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希腊语、拉丁语以及希伯来语。德勒兹以哲学家的睿智精准定位了卡夫卡与意第绪语的关系“他与其说把意第绪语看做犹太人的一个语言地域，毋宁说将其视作重振德语语言的解域游牧运动。”<sup>⑤</sup>卡夫卡是善用寓言和比喻的大师，他恰如其分地将德语比作“身体中的知识”，而意第绪语则是运用知识的“力量”，而理解就发生在“力量”与“知识”交汇和碰撞的瞬间。卡夫卡惊呼“俚语是一切，是言语，是犹太音调，是这个东部犹太演员自身的本质……是自身的统一性。”<sup>⑥</sup>这是卡夫卡对小民族语言特征的精辟论述和准确定位，成为日后德勒兹构建小民族文学理论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原点。因此，卡夫卡这篇有关“俚语”（即意第绪语）的演讲就是有关小民族语言的思想源头，对于相关研究者而言弥足珍贵。

## 二、德勒兹的哲学解读与阿契贝的小民族语言实践

根据卡夫卡的描述，意第绪语是欧洲最年轻的语言，尚未形成清晰的语言形态，表达“短而迅速”。在卡夫卡看来，意第绪语是一门没有语法的语言，原因在于它不断生成，“永远没有平静的时候”。总之，“人民不愿意把它交给语法学家”。<sup>⑦</sup>因此，众多外来语言成分并不在意第绪语中“安歇”，随着民族的迁移保持着“匆忙和活跃”。由此可见，小民族文学的语言强烈地表现为一种流动性或游牧特

征，总是处于不断生成（becoming）之中。德勒兹从语音、词汇和句法等方面分析了卡夫卡的小民族语言特质，我们也不妨对德勒兹“千座高原”似的评论碎片进行分类、梳理和重新拼装，从中生成评论阿契贝文学语言的新方向，获得能够“穿透”传统评论话语的“逃逸线”。

第一，小民族语言的特征表现为语音的非意指“震颤”。对此，德勒兹有一段极具哲学穿透力的思辨。小民族文学所发出的声音是“被解域的、意义被再辖域的噪音”，因此语音本身被“解域”，且“无可挽回、彻彻底底”。<sup>⑧</sup>德勒兹由此得出了结论，即小民族文学的语言虽然源自大民族语言中语音与语义的辖域关系，但已不再是属于“意义”的语言（a language of sense）。换言之，“意义”的语言遭到了“逃逸线”的穿透，所生成的语言是“从意义中撕扯出来的语言、征服了意义的语言、积极抵消了意义的语言，除了词语的重读和语音抑扬顿挫外别无意义”。<sup>⑨</sup>在日记中，卡夫卡回忆自己孩提时代重复父亲口中的“月末、月末”，以便让它从无意义的路线上逃走。在《城堡》的开头，教堂后面的学校中，学生们“叽叽喳喳说个没完，说得很快，K根本无法听懂”。<sup>⑩</sup>学生们显然精通于重复单词的练习，而被朗读的单词意义模糊不明，目的便是让朗诵在单词周围“震颤”（vibrate）。德勒兹以上抽象艰涩的表述起码给我们以下启发：小民族文学虽然挪用了大民族文学的语言，却同时解域了大民族语言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用语音的“逃逸线”穿透了大民族文学的“意义”，正如卡夫卡作品中老鼠的呼哨、猴子的咳嗽等试图废除“组织化的音乐”（organized music）。阿契贝的小说中也散落了“除了词语的重读和语音抑扬顿挫外别无意义”的小民族语言的具体现象，它们往往令读者费解，令那些高高在上的西方评论家侧目，殊不知这些正是小民族文学力图发出的

萨拉)

鼓声又起，笛子也被吹响。伊戈吾戈吾（egwugwu）的屋子里传来一阵杂乱的颤音：当祖先的神灵刚从地下现身，开始用

其次，小民族语言的特征表现为词汇和句法的“张力”。德勒兹认为卡夫卡运用的所谓“布拉格德语”还表现出“枯萎的词汇”（withered vocabulary）和“不正确的句法”（incorrect syntax）的特征。专事卡夫卡研究和传记写作的学者克劳斯·瓦根巴赫（Klaus Wagenbach）概括了卡夫卡德语的语法和词汇特征，包括介词的误用、代词的滥用、可塑性动词的运用、副词的繁殖和连续、以及辅音和元音作为内在不和谐的分布。德勒兹称以上这些表现了“语言的内在张力”（internal tensions of a language）的语言元素为“张度”（intensives）或“张量”（tensors）。<sup>⑬</sup>正是得益于这种“张力”、“张度”或“张量”，卡夫卡笔下的布拉格德语才达成了对于大民族德语的解域，创造性地表现出一种“新的冷静、新的表现力、新的灵活性和新的强度”。在此，我们也不得不提到卡夫卡在那篇有关意第绪语的

演讲中同样令人“震颤”的论述。正因为意第绪语是对德语的小民族应用，卡夫卡认为每个掌握了德语的人都能够听懂意第绪语，原因在于意第绪语“最外层的可理解性是由德语构成的”。<sup>⑭</sup>与此同时，作为小民族语言的意第绪语与德语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之间的联系“太柔软”，因此卡夫卡认为，如果把意第绪语“引回德语中去，它马上就会被撕成碎片，回去的将不是俚语，而只是一个躯壳”。<sup>⑮</sup>无独有偶，同为小民族作家的阿契贝在评论自己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时，也发表过颇为近似的观点。阿契贝摘取了《神剑》( *Arrow of God* ) 中的一段文字，同时配以“标准”英文（即作为大民族语言的英文）的版本，以为比照：

I want one of my sons to join these people and be my eyes ( 眼睛 ) there. If there is nothing in it you will come back. But if there is something there you will bring home my share. The world is like a Mask ,dancing. If you want to see it well you do not stand in one place ( 不能原地不动 ). My spirit tells me ( 我的神灵告诉我 ) that those who do not befriend the white man today will be saying had we known tomorrow ( 明天会说如果当时认识就好了 ).<sup>⑯</sup>

I am sending you as my representative ( 我的代表 ) among those people — just to be on the safe side in case the new religion develops. One has to move with the times ( 与时俱进 ) or else one is left behind. I have a hunch ( 我有预感 ) that those who fail to come to terms with the white man may well regret their lack of foresight ( 会为自己缺乏远见而后悔不已 ).<sup>⑰</sup>

原文中的“眼线” ( eyes ) 正是借用和解域了大民族语言中“眼睛”这个外层的“躯

壳”，同时大民族文学中固有的、能指与所指构筑的辖域被打开了，即“眼睛”的所指从原有的辖域中逃逸出来，指向“眼线”或“盯梢人”的意义。然而，无论“眼线”，抑或“盯梢人”，都与“眼睛”有着明显的语义关联，因此小民族文学语言的解域性是有限度的，语言“震颤”发生在一定的限度内，而未“崩塌”殆尽，逃逸后语言的表层“躯壳”依然能够辨识。套用卡夫卡的表述，宗主国英文为阿契贝的小民族语言提供的是一种“最外层的可理解性”；因此，阿契贝推知读者从“eyes”中可解读出“representative”。此外，两段文字中的类似对应表达，如“do not stand in one place”与“move with the times”、“My spirit tells me”与“I have a hunch”、“will be saying had we known tomorrow”与“may well regret their lack of foresight”，皆可视作小民族语言与大民族语言之差异。同一篇文章中，阿契贝声称：

如果要问他（非洲人）能否像母语使用者一样使用英语？我会说我不希望如此……一种世界性语言必须付出的代价就是要向许多不同的用法妥协。非洲作家在使用英语时，应该既表达出自己的思想，又不能过分修改英语以至于丧失其作为国际交流中介的价值。他应该努力塑造这样一种英语，既是普遍适用的，同时又能传达他独特的经验。<sup>⑱</sup>

阿契贝清醒地意识到，即便他能够以标准的英文写作，将小民族语言“引回”大民族语言的“标准”中去，他所得到的不过是没有价值的“碎片”和“躯壳”而已，小民族语言天然具有的解域性和革命性优势也就无迹可寻了。既然如此，小民族语言在语法和词汇等微观形式层面上究竟表现为何种特征呢？德勒兹并未将精彩的哲学思辨诉诸具体而微的文

本分析。尽管如此,德勒兹毕竟从形而上的层面指出了小民族语言的两种趋势:一是“贫乏化”(impoverishment),即句法或词汇形式的枯竭。<sup>⑩</sup>在阿契贝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文本现象,例如《人民公仆》有这样一段楠加酋长(Chief Nanga)家的独眼家丁多哥(Dogo)与来访者的对白:

“Who you want?” he scowled.

“Chief Nanga.”

“He give you appointment?”

“No, but...”

“Make you park for outside. I go go hasham if he want see you. Wetin be your name?”<sup>⑪</sup>

(“你找谁?”他瞪着眼睛问道。

“南加大人。”

“他答应要见你?”

“没有,不过……”

“把车停外面。我去问问他要不要见你。报报你的名儿吧。”)

短短三个来回的对话中,我们便可以注意到德勒兹所谓“贫乏化”的微观表现:如疑问句中助动词(do)的缺失、主语与谓语之间数的不一致(He give, he want)、动词不定式标记词(to)的省略、动词(be)的抽象化等。对此,德勒兹认为,所谓“贫乏化”并非是欠缺,而是空隙(void)或省略(elipsis),目的是对“常量”(constants)加以限制。

除“贫乏化”外,小民族语言的另一特征则是“流变效应的繁殖”(proliferation of shifting effects)、即对“超负荷”(overload)和“诠释”(paraphrase)的偏爱。德勒兹所谓的“超负荷”并非一个修辞、隐喻或象征结构,而是“流动的诠释”(mobile paraphrase),是每个陈述的“非本土化呈现”

(unlocalized presence)或“间接话语”(indirect discourse),是对“参照点”(reference points)的拒斥,是对“稳定形态”(constant form)的消解。<sup>⑫</sup>总之,所谓“流变效应的繁殖”可解释为对动态的差异、变量和生成(becoming)的青睐。阿契贝作品中与此对应的语言表现更为普遍,尤其反映在大量非洲本土谚语,即卡夫卡所谓的“俚语”。我们不妨从阿契贝的另一篇小说《动荡》(No Longer at Ease)中择取语料,略作分析。小说采用倒叙手法,开场便是主人公奥比(Obi)——一名曾留学英国、归国后供职于政府部门的非洲青年——因受贿锒铛入狱,而奥比的族人在首都成立的互助组织“乌默邦进步联盟”为此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之策。族人们曾合力资助奥比远赴海外求学,奥比不负众望,回国后顺利获得令人艳羡的政府公职,一度成为族人的荣耀。然而好景不长,此后奥比的种种言行令族人大失所望,直至愤怒绝望。然而,当奥比身陷囹圄,危在旦夕之时,族人们却能搁置对奥比的怨恨,积极商议营救之策。阿契贝以非洲特有的语言描述了此时众人“先攘外,后安内”的独特文化心理:

The fox must be chased away first; after that the hen might be warned against wandering into the bush.<sup>⑬</sup>

“乌默邦进步联盟”的主席声明自己对腐败行为的反对态度,阿契贝在小说中表达为:

I'm against people reaping where they have not sown.<sup>⑭</sup>

旋即,这位主席话锋一转,为奥比收受区区20磅贿赂而唏嘘不已,阿契贝再次掺入了鲜活的非洲意象:

But we have a saying that if you want to eat a toad you should look for a fat and juicy one.<sup>24</sup>

阿契贝将非洲本土文化的意象掺入英文写作之中，以此松动甚至打破了作为大民族语言的英文的“参照点”，代之以“狐狸与母鸡”、“播种与收割”、“个大汁肥的蛤蟆”等别具非洲语言文化特征的“诠释”或“间接话语”，最终解域了大民族语言的“稳定形态”，不断生成“流变效应”。此外，小民族语言的所谓“超负荷”实际就是打破大民族语言句法结构的规范，使其失去平衡，使其“震颤”。举例说明：

“How de go de go ?” I asked.

“Bo, son of man done tire.”

“Did you find out about that girl ?” I asked.

“Why na soso girl, girl, girl, girl been full your mouth. Wetin ? So person no fit talk any serious talk with you. I never see.”<sup>25</sup>

(“咋样啊?”我问。

“没啥，只是有点儿累。”

“你知道那姑娘是谁吗?”我又问。

“姑娘、姑娘，姑娘，满嘴尽是姑娘呢？跟你就说不上一点正经事儿。”)

以上划线部分皆为词汇短语的重复，这在大民族语言中显然被视作讹误或蹩脚的英文，然而这恰恰就是小民族语言对大民族语言解域的场域，是对大民族语言“小民族化”(becoming minor)的标记，以小民族语言“How de go de go”的变体(variation)取代大民族语言“How are you”的常规(constant)，以“soso girl, girl, girl, girl”取代“so many girls”。实际上，我们只是举出了个别较为

“强力”的语料，如果细读文本，类似小民族语言的句法结构变体在阿契贝的作品中可谓俯拾皆是，这也就是读者阅读时所感受到的那种难以名状的“异国情调”的部分原因，也是德勒兹所说的“流变效应的繁殖”在阿契贝文本中的具体表现。

### 三、卡夫卡的“不可能”与阿契贝的解域生成

对于犹太德语或布拉格德语，卡夫卡的态度是暧昧和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犹太德语是“美妙的”，是一种“细腻语感的产物”，只有在犹太人的手里德语才有“生命的假象”；与此同时，卡夫卡曾在日记中描述了日常生活中使用德文的“母亲”一词称呼自己犹太母亲时的尴尬场景，他感觉到母亲对此称谓颇感滑稽奇怪，因而卡夫卡感到“德语阻碍了我的表达”。<sup>26</sup>1921年，卡夫卡在写给马克斯·布罗德(Max Brod)的一封信中，诉说了犹太人用德语写作尽管貌似德语文学，而实则不然的“可悲性”。卡夫卡在此提出了犹太人以德语写作的诸多不可能：不写作的不可能、用德语写作的不可能、用其他语言写作的不可能。似乎用德语写作如同把德国孩子从摇篮中偷出，匆匆忙忙地安置一下，因为总得有人去绳索上跳舞……<sup>27</sup>对此，德勒兹认为，所谓不写作的不可能是不确定的和被压迫的民族意识必须通过文学而存在；用德语写作的不可能在于操德语的布拉格犹太人说着一一种与周围断裂的“书面语”(paper language)或人造语(artificial language)；而用其他语言写作的不可能在于布拉格犹太人已经与他们原先的捷克语言的辖域之间产生了难以缩减的距离。<sup>28</sup>我们不妨透过卡夫卡极具个性的语言表达的“外壳”进入其意义的“城堡”。所谓不写作的不可能，实质指向小民族文学的政治属性，即文学成为民族表达的工具和方式，有时甚至是惟一手段，文学

对小民族而言变得生死攸关。第二,所谓德语写作的不可能,德勒兹在解释时使用了“the deterritorialization of the German population”的表述。在此,“the German population”应理解为操德语的犹太人,他们虽然使用德语,但由于身处布拉格而远离作为大民族的德意志民族的德语使用者,因此他们与周围的语言环境是“断裂”的,而在此环境中的德文因失去“标准德语”的滋养而成为书面语或人造语。第三,由于犹太民族的游牧性或迁徙常态,他们的捷克语已经被解域,发生了新的“生成”(becoming),这是所谓以其他语言写作的不可能的内涵。

仔细分析后,我们不难体察到卡夫卡的潜意识中深藏着语言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思想意识。直言之,解域后的德文便不再是德文,解域后的捷克文也不再是捷克文,这恐怕是卡夫卡始终被所谓德语写作的“可悲特性”的阴影笼罩的思想根源。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阿契贝与卡夫卡分道扬镳,也是他胜过卡夫卡一筹的地方,尽管阿契贝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影响和地位并不及卡夫卡。

如何界定非洲文学,这是作为小民族语言作家、以社会导师自居的阿契贝必须回答、无法回避的问题。阿契贝一再强调非洲文学尚处于幼年期,他以招牌式的隐喻手法给出了一段精彩的阐述:

我们今天往往认为非洲文学是一个新生儿。但实际上,我们拥有的是一代新生儿。当然,如果你只是以好奇的目光打量,这些新生儿彼此颇为相似;可实际上每个新生儿都已经沿着不同的路径成长了……你可以根据他们说的语言或他们父辈的宗教信仰将他们归类。这些都是有效的分类;但这些分类均不能完全解释每个个体携带的,比方说,他自己微小而独特的基因特征。<sup>②</sup>

阿契贝以“新生儿”为喻,揭示了本质主义的同质性并不存在。人们常常认为北非文学的传统有别于沙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地区,但“黑非洲绝非同质的”。<sup>③</sup>至此,阿契贝为切入语言的讨论做好了铺垫。当卡夫卡为所谓“标准德语”写作的不可能而暗自神伤时,阿契贝反而为“标准英语写作的不可能”而欢欣鼓舞,即解域后的英文绝非卡夫卡所谓的“书面语”或“人造语”,绝未切断与非洲自然社会环境的联系。阿契贝以诗人好友克里斯托弗·奥基博(Christopher Okigbo)的一段英文诗为例:

Suddenly becoming talkative  
Like weaverbird  
Summoned at offside of  
Dream remembered  
Between sleep and waking  
I hand up my egg-shells  
To you of palm grove,  
Upon whose bamboo towers hang  
Dripping with yesterupwine  
A tiger mask and nude spear...<sup>④</sup>  
(突然间喋喋不休  
如同织巢鸟  
从梦境中唤醒  
徒留半梦半醒的回忆  
我伸手递上蛋壳  
给棕榈林的你  
林子的竹塔之上  
悬着虎形面具、无雕饰的矛……  
滴着叶思特普酒)

卡夫卡所谓的小民族德语在布拉格的“断裂”并不适用于英文在非洲的经验。这首诗中的众多意象,如“织巢鸟”(weaverbird)、“棕榈林”(palm grove)、“竹塔”(bamboo towers)、“虎形面具”(tiger mask)



等,皆与典型的非洲自然和社会生态息息相关。实际上,颇具解域性的小民族英文“充满了令人极为兴奋的可能性”。此外,当卡夫卡为“以其他语言写作的不可能”而郁郁寡欢时,阿契贝也点出了非洲民族语言与小民族英文的相互解域关系。在论及为数众多的尼日利亚民族语言时,阿契贝指出这些语言能够“作为支流哺育”英文。德勒兹在《千座高原》中,以黄蜂与兰花之间相互解域和再辖域的交互依赖关系,说明“黄蜂和兰花作为相异的因素而构成一个块茎”。<sup>③</sup>德勒兹以哲学家深邃的洞察力否认黄蜂与兰花之间存在模仿关系,二者“捕捉符码,符码的剩余价值,增值,可验证的变化,正在变成兰花的黄蜂和正在变成黄蜂的兰花。每一种变化都把一方的解域变成另一方的再辖域,这两种变化互相关联……进一步推进解域”。<sup>④</sup>德勒兹的这番论述对我们认识小民族语言与本土语言的关系,以及对于正确评判卡夫卡的语言观,提供了思想的利器。卡夫卡为“割裂”的布拉格德语而深感懊恼,但阿契贝的论述说明:小民族语言从大民族语言中“逃逸”后进入非洲文学的异质空间,它与非洲民族语言的关系恰如德勒兹借用的兰花与黄蜂的关系那样构成一个块茎整体。作为小民族语言的英文与非洲民族语言并非模仿关系,即一方变成另一方或者一方被另一方“吞并”的关系,而是互为解域和再辖域的块茎关系,互相“捕捉”对方的“剩余价值”。一言蔽之,二者在构成块茎后各自发生解域,又因此发生新的辖域,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这实际上就是阿契贝语言观的思想本质或哲学根源。

卡夫卡作为现代文学大师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小民族德语的解域性所带来的、有别于大民族德语的诸多“可能性”。卡夫卡对自己语言的认识显然有局限性,虽然意识到布拉格德语比较大民族德语更有生命,但同时哀叹这不过是“假象”罢了。在这一点上,

阿契贝的语言观明显超越了卡夫卡,他不仅是小民族语言的文学大师,同时也是极具小民族文学批判意识和锋芒的思想家。

#### 注释:

- ① W. J. T. Mitchell, “Postcolonial Culture, Postimperial Criticism”, in *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eds.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475.
- ② Henry Y. H. Zhao, “Post-Isms and Chinese New Conservatism”, *New Literary History*, 28. 1 (1997), p. 41.
- ③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trans. D. Pola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c1986), p. 16.
- ④ 胡志明《卡夫卡现象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364页。
- ⑤ Gilles Deleuze & Félix Guattari,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p. 25.
- ⑥ Klaus Wagenbach, *Franz Kafka*, trans. Ewald Os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14.
- ⑦ 卡夫卡《误入世界:卡夫卡悖谬论集》,叶廷芳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11页。
- ⑧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p. 21.
- ⑨ Gilles Deleuze & Félix Guattari,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p. 21.
- ⑩ 卡夫卡《卡夫卡文集》第1卷,高年生译,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8页。
- ⑪ Chinua Achebe, *Things Fall Apart* (London: Heinemann, 1958), p. 42. (下文引用自该作品的内容,均在正文中随文标注页码。)
- ⑫ Gilles Deleuze & Félix Guattari,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p. 22.
- ⑬ Gilles Deleuze & Félix Guattari,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p. 22.
- ⑭ Klaus Wagenbach, *Franz Kafka*, p. 214.
- ⑮ 卡夫卡《误入世界:卡夫卡悖谬论集》,213页。
- ⑯ Chinua Achebe, “The African Writer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Chinua Achebe, *Morning Yet on Creation Day* (London: Heinemann, 1975), p. 101.
- ⑰ Chinua Achebe, “The African Writer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Chinua Achebe, *Morning Yet on Creation Day*, p. 102.

- ⑮ Chinua Achebe, “ English and the African Writer ”, in *Transition*, 18 ( 1965 ), p. 29.
- ⑯ Gilles Deleuze &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and foreword by Brian Massumi (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 p. 104.
- ⑰ Chinua Achebe, *A Man of the People* ( London: Heinemann, 1966 ), p. 39.
- ⑱ Gilles Deleuze &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p. 104.
- ⑲ Chinua Achebe, *No Longer at Ease* ( London; Ibada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60 ), p. 5.
- ⑳ Chinua Achebe, *No Longer at Ease*, p. 6.
- ㉑ Chinua Achebe, *No Longer at Ease*, p. 6.
- ㉒ Chinua Achebe, *No Longer at Ease*, p. 19.
- ㉓ Franz Kafka, *The Diaries of Franz Kafka: 1910 – 1923*, ed. Max Brod (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4 ), p. 88.
- ㉔ 弗兰茨·卡夫卡 《卡夫卡全集》, 叶廷芳主编, 洪天富、叶廷芳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419 – 421 页。
- ㉕ Gilles Deleuze & Félix Guattari,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p. 16.
- ㉖ Chinua Achebe, “ The African Writer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 in Achebe, *Morning Yet on Creation Day*, p. 93.
- ㉗ Chinua Achebe, “ The African Writer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 in Achebe, *Morning Yet on Creation Day*, p. 93.
- ㉘ Chinua Achebe, “ The African Writer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 in Achebe, *Morning Yet on Creation Day*, p. 99.
- ㉙ Gilles Deleuze &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p. 10.
- ㉚ Gilles Deleuze &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p. 10.

( 作者单位: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 段映虹

#### 作者补充说明

本刊 2015 年第一期发表的《外交书信与传记研究——赫梯国王哈吐什里三世致巴比伦国王卡达什曼 – 恩里尔二世的书信的传记价值》一文, 其附录的译文据贝克曼的英译本, 出处同正文注释③。特此说明。

**A Study of the Crisis of Science Ethics in America in E. L.  
Doctorow's *The Waterworks* and *The March***

**XU Zaizhong**

E. L. Doctorow is a famous contemporary American historical novelist. His novels often feature a criticism of the American social reality by poeticizing American history. In *The Waterworks* and *The March*, the author makes use of historical events of the Gilded Age and the Civil War and his rich imagination to criticize the crisis of science ethics in America under the impact of scientism: scientists'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vulnerable mercilessly in scientific experiments, the complicity of science with wealth and power, and scientists' alienation in ethical emotion while they are in excessive pursuit of rational knowledge, hence turning themselves into scientific grotesques. To investigate the ethical problem in scientific researches in America and its ill social consequences from the above three aspects will not only enhance readers' understanding of Doctorow and his novels, but also inspire them to reflect upon the ethical problems occasion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chebe and Deterritorializing Literary Practice of a Minor Language**

**YAO Feng**

This paper focuses on a key concept of Gilles Deleuze's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minor language, initially proposed by Franz Kafka and later systematically and philosophically expounded by Deleuze. The theory of minor language has provided a unique critical weapon for postcolonial literary criticism.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e Nigerian postcolonial writer Chinua Achebe, celebrated as the founding father of African literature, is a successful minor language writer, which is demonstrated with a minute textual analysis of Achebe's imaginative writing. As to the issue of literary language, long disputed among African writers and critics, Achebe posits that African English possesses a unique role and value for African literature and even world literature at large. Therefore, English writing as a minor language in Africa is by no means inferior to creative writing in English as a major language. Rather, it is a territorializing practice, which is in sharp contrast to Franz Kafka's denigrating interpretation of a minor language. Finall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a minor language lies in deterritorialization, forever breaking free of stereotypical territorialization and enabling literary study and creation to be involved in an incessant state of "becoming" and "escaping".